

普达措和老君山国家公园社区参与旅游比较研究

王立鹏¹，唐晓峰

（西南林业大学，云南 昆明 650224）

【摘要】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是实现社区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从社区参与旅游收益分配、参与旅游经营和工作、参与旅游资源保护、参与旅游发展决策四个方面对普达措和老君山国家公园社区参与旅游进行比较。结果表明：在社区参与旅游收益和社区参与旅游资源保护方面普达措优于老君山国家公园，在社区参与旅游经营和工作、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决策方面两个国家公园没有明显差异。对两个国家公园社区参与旅游差异和共同点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为实现社区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社区参与旅游；国家公园；普达措；老君山

【中图分类号】F592.7；F205 **【文献标识码】**A

“社区参与”的概念起源于西方，由墨菲 Petery E Murphy 在其著作《旅游：社区方法》中提出。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是指把社区作为主体介入到规划、开发等涉及旅游发展重大事宜的决策、执行体系中，是实现社区贫困人口自身发展与社区旅游可持续发展相协调的旅游扶贫模式，尤其在贫困的农村地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普达措和老君山国家公园社区居民生活较为贫困，国家公园建立后，解决社区居民扶贫问题是其发展中的现实问题。因此，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是其实现社区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本文从社区参与旅游收益分配、参与旅游经营和工作、参与旅游资源保护、参与旅游发展决策四个方面对普达措和老君山国家公园社区参与旅游现状进行对比，对两个国家公园社区参与旅游现状差异和共同点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为实现社区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1 研究区域概况

普达措和老君山国家公园位于滇西北“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地带，分别成立于2007年和2009年，是云南省人民政府批准同意的第一批国家公园。

普达措国家公园位于迪庆州香格里拉县城以东，范围 $99^{\circ} 59' 16'' \sim 100^{\circ} 02' 38'' E$ ， $27^{\circ} 43' 52'' \sim 27^{\circ} 58' 30'' N$ ，总面积约 $602.1 km^2$ 。由地碧塔海自然保护区和都湖景区两部分构成。按土地利用类型不同可将普达措国家公园分为：特别保护区、自然生境区、户外游憩区、文化保存区、服务区、引导控制区。普达措国家公园范围内村落和牧场所涉及的社区有洪坡村、尼汝村和九龙村3个行政村，经济比较落后，其中九龙村为彝族村落，洪坡村、尼汝村为藏族村落。

老君山国家公园位于丽江市玉龙县西部，三江并流遗产地东南地带，范围 $99^{\circ} 7' \sim 100^{\circ} 00' E$ ， $26^{\circ} 38' \sim 27^{\circ} 15' N$ 。

¹【收稿日期】2017-04-20

【作者简介】王立鹏（1989-），男，安徽临泉人，研究生。

总面积为 1085 km²，由黎明丹霞地貌、格拉丹草原、九十九龙潭和金丝厂四个片区组成。海拔 2100~4500m，作为“三江并流”世界遗产地的核心区域之一，具有丰富的生物、地质和景观多样性资源，按土地利用类型不同可将老君山国家公园分为：特别保护区、一般控制区、游憩活动区、公园服务区、传统利用区。老君山国家公园范围涉及乡镇包括石鼓镇、黎明乡、石头乡、九河乡 4 个乡镇，居住有傈僳、纳西、汉、白、藏、彝、苗、普米等民族，是一个多民族交错杂居的地区。在数千年历史发展过程中，各民族为了适应自然环境，产生了各具特色的民族传统文化。黎明乡位于老君山黎明丹霞地貌片区，黎明村和黎光村位于黎明丹霞地貌片区旅游开发核心区域，居住有傈僳族、纳西族、汉族、彝族、白族等民族，黎明村共有 749 户，2905 人，黎光村共有 357 户，1798 人。本研究选取黎明村和黎光村作为老君山国家公园社区调查区域，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2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源于作者于 2016 年 5、6 月先后在普达措和老君山国家公园社区进行的居民问卷调查和对国家公园旅游经营公司实地调查。国家公园社区调查面向家庭住户的成年居民，在普达措和老君山国家公园分别发放问卷 87 份和 128 份，社区居民问卷调查的主要内容有：个人基本信息、家庭经济情况、家庭成员受教育情况、家庭成员参与国家旅游经营和景区工作情况、参与旅游发展决策情况。国家公园旅游经营公司实地调查主要内容有：历年国家公园收入、社区反哺标准及资金投入。

3 调查结果

3.1 社区参与旅游收益分配普达措国家公园第一期社区反哺开始于 2007 年，第二期社区反哺开始于 2013 年，共涉及普达措国家公园社区居民 758 户，3406 人。公园第二期社区直接生态反哺标准：一类区：（洛茸）每户每年 13000 元+每人每年 5000 元、（红坡村一社）每户每年 10000 元+每人每年 5000 元。二类区：（红坡村二社、红坡村三社、九龙村）每户每年 2500 元+每人每年 1000 元、（移民组）每户每年 2000 元+每人每年 1000 元。三类区：每户每年 2000 元+每人每年 1000 元。根据国家公园社区直接反哺资金差异，社区调查采取分层抽样调查的方式进行，涉及三个不同反哺标准的社区，普达措国家公园一类区、二类区和三类区的第一期直接反哺都得到贯彻，部分二类区和三类区的第二期直接反哺并未实施，第一期直接反哺标准中三类区与一类区的户均每年直补金额差为 4700 元，到二期时扩大为 11000 元，二类区和三类区居民认为自己所在区域第二期反哺金额与一类区差距过大，从而拒绝接受二期补偿。

老君山国家公园黎明和黎光六个村小组 180 户，700 人接受征地反哺。老君山国家公园黎明景区由于景区建设需要，2014 年丽江旅游投资公司与黎光村河上组、河下组，黎明村上组、中组、下组、支独底组、克独底组六个村小组签订征地反哺协议。依据协议，被征地的家庭从 2014 年开始，每人每年可获得 2400 元征地反哺金，每两年上浮 10%。社区调研时发现，接受征地反哺的社区居民实际受到的反哺金额为 2600 元。

3.2 社区参与旅游经营和工作

在普达措国家公园社区居民被调查的样本中，只有 1034%的居民参与旅游经营和工作。其中国家公园环卫人员 6 人、检票员 1 人、观光车司机 2 人。在老君山国家公园社区居民被调查的样本中。只有 9.38%的居民参与旅游经营和工作，其中电瓶车司机 3 人，环卫人员 1 人，餐饮部员工 1 人，客房部员工 2 人、户外运动销售员 1 人、餐厅经营 2 人、旅馆经营 2 人。

3.3 参与旅游资源保护

在参与生态环境保护方面，普达措国家公园洛茸村居民，每个月的第一天会在村内进行打扫卫生活动，初步显示了社区居民对社会整体的利益关注，居民开始以一种“主人翁”的姿态参与到旅游业中，而老君山国家公园社区居民尚无此类生态环境保护行动。

3.4 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决策

社区参与与旅游发展决策包括授权居民自行决定旅游发展目标，倾听居民对发展旅游的希望与看法，并将这些意见纳入政府的决策之中。两个国家公园旅游发展决策的主体都是国家公园管理局和旅游经营企业。在被问及是否参与国家公园旅游发展决策时，普达措和老君山国家公园的受访者均表示没有参与国家公园旅游发展决策。

4 结论与讨论

4.1 研究结论

4.1.1 在社区参与旅游收益和社区参与旅游资源保护方面普达措优于老君山国家公园。具体表现在：普达措国家公园社区居民所接受直接反哺的人数和金额多于老君山国家公园，普达措国家公园社区居民有参与生态环境保护行动，而老君山国家公园社区居民尚无此类生态环境保护行动。

4.1.2 社区参与旅游经营工作和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决策方面，普达措和老君山国家公园没有明显差异。具体表现在：在社区居民调查样本中，普达措与老君山国家公园社区参与旅游经营和景区工作的比例相近，两个国家公园受访者均表示没有参与国家公园旅游发展决策。

4.2 讨论

国家公园的社区参与旅游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国家公园对社区居民基本补偿资金的多少，与国家公园经营状况密切相关。2007 年和 2013 年普达措国家公园旅游收分别为 1.04 亿元和 2.43 亿元，相比之下，老君山 2013 年旅游总收入仅为 553.92 万元。较高的旅游收益是普达措国家公园进行大范围社区直接反哺的主要原因。普达措国家公园社区居民生态环境保护行为的产生，得益于普达措国家公园较为合理的生态反哺政策。普达措国家公园建立后，出于保护和规范管理的需要，社区的无序的旅游经营服务项目被全面取消，其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也受到限制，为补偿社区损失，公园方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形成社区生态补偿机制，使社区居民从旅游发展中受益，社区居民放弃牵马服务和采集林下资源等对资源破坏大的活动，积极参与到国家公园资源与环境保护中来，产生了居民生态环境保护行为。两个国家公园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决策的缺失，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和政府行政管理体制密切相关。在西方社会，“公众参与”的理念是与其民主制度的形成相伴而生的。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民意思识淡泊，政府行政管理体制中权力相对集中，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居民参与机制的形成。社区居民经济生活水平低，限制了其参与旅游经营的能力和机会。普达措国家公园是在原有碧塔海自然保护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老君山国家公园的前身是老君山国家地质公园，自然保护区和地质公园均为我国保护地体系的一种。以自然保护区为例，自然保护区的严格管理制度、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不健全、自然保护区内旅游开发利益分配机制问题成为自然保护区居民生产生活的限制因素，导致了自然保护区居民普遍生活贫困。国家公园建立以后，采取了诸如直接反哺、间接反哺、提供景区工作等有益于社区居民增加收入措施，社区居民生活状况有一定改善，但是由于国家公园自身建设能力和区内旅游开发的利益分配机制问题限制了居民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根据问卷统计结果，普达措国家公园社区人均年收入为 4859.81 元，恩格尔系数为 55.10%。老君山国家公园社区居民人均年收入为 5526.61 元，恩格尔系数 52.58%。两个国家公园居民的社会生活水平仅达到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标准中的温饱水平，生存问题仍是社区居民所关心的首要问题，当他们基本的物质生活需求得不到保障时，就不会对旅游经营感兴趣。

【参考文献】

- [1] 潘秋玲, 李九全. 社区参与和旅游社区一体化研究[J]. 人文地理, 2002, 17 (4) : 38-41 .
- [2] 刘纬华. 关于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若干理论思考[J]. 旅游学刊, 2000, 15 (1) : 47-52 .
- [3] 杨阿莉, 把多勋. 民族地区社区参与式旅游扶贫机制的构建——以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为例[J]. 内蒙古社会科学, 2012, 33 (5) : 131-136 .
- [4] 黄芸玛, 陈琼, 李春花. 少数民族村落社区参与旅游模式的游客感知视角研究——以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小庄村为例[J]. 青海社会科学, 2015, (3) : 198-204 .
- [5] 叶文, 沈超, 李文龙. 香格里拉的眼睛——普达措国家公园规划和建设[M]. 北京: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2008 : 46 .
- [6] 张一群, 孙俊明, 唐跃军, 等. 普达措国家公园社区生态补偿调查研究[J]. 林业经济问题, 2012, 32 (4) : 301-307, 332 .
- [7] 孙九霞, 保继刚. 从缺失到凸显: 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研究[J]. 旅游学刊, 2006, 21 (7) : 63-68 .
- [8] 龙耀, 李雪岩. 自然保护区对居民的影响和对策研究[J]. 武汉理工大学学报, 2014, 27 (06) : 1065-1070, 1086 .